

田川:在艺人身上发现“文化中国”

十年前,因为出版了《草莽艺人》,田川进入中央电视台开始拍纪录片。今年《草莽艺人》一书再版,田川离开了央视,忙于自己的工作室。他说,这是一个巧合的轮回。“田川的《草莽艺人》以平实的态度讲述了北中国数省艺人们的生活,他把寻找艺人、观看艺人在台前台后的言行等过程写了出来,二人转、丝弦、晋书、皮影、河北梆子等,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复调式中国生活图景”,这是余世存对《草莽艺人》的概括。

《东京记》《草莽艺人》是田川最初的两部作品,“它就代表那时期我的认识,做修改就不伦不类了。”再版,除了增加一篇余世存的序言《农民中国里的艺人命运》,没什么太大的变动。

2006年,田川出版过一本《寻找英雄——抗日战争之民间调查》,这是因为2005年中央电视台做了一套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纪录片,“我做了很长时间,很多采访人在之后一两年之内就故去了。而很多有价值的材料不能播。”田川觉得很可惜,于是把电视里没呈现的部分公之于众,这样就有了《寻找英雄》。“尽量文字少用形容词,用最简单的话把你心里的想法说出来”,这是田川写作时对自己的要求。



田川 北京人。纪录片工作者,曾制作《回望梁启超》《满江红——抗战珍稀影像全纪录》等纪录片。出版了《四季日光》《寻找英雄》《草莽艺人》《东京记》等。

《草莽艺人》的因缘

记者:你从日本回来不久,什么契机促使2002年《草莽艺人》的出版?

田川:当时国内很流行说“看图时代”,很多以摄影、图片为主的杂志出来。编辑杨全强在南京做一个叫《光与影》的杂志,我刚从日本回国,也没工作,我把在日本拍的照片投稿到《光与影》杂志,杨全强对我有了印象,后来他进出版社了,先邀我写《东京记》。这时我已经去过两个地拍过艺人,先是北京湖广会馆的“北昆”,后来又去了一趟山西。所以《草莽艺人》和《东京记》两本书是同时写的,《东京记》写得靠前一点,写闷了,就想出去转转,没什么目的地去找那些艺人。

所以拍草莽艺人的时候,没想过出书。《草莽艺人》和《东京记》是一个钢镚儿的两面。两本书都是重新找回自己的过程。过去几年在异域的生活要记录下来,未来怎么重新适应祖国和社会,我希望通过一个不同于出国之前的观点去找自己,我找的人都是我曾经忽视的、完全没关系的那些人。

记者:《草莽艺人》其实挺难在图书种类中进行归类,是吧?

田川:当时我是想把它弄一个小说似的。《草莽艺人》我相信比《东京记》要小众多了。看的人一定很感兴趣,所以你让他能进入得快一点,前几篇是比较好玩、轻松一点的,进去以后就是那些沉重的东西、活色生香的东西。

最早给《光与影》杂志投稿的时候,我是想做纯摄影,但2000年回国以后,我发现大家没时间拿着一张照片好好看。都要你写很多照片说明,讲背后的故事,要不然就看不懂似的。文字恰恰又是我很擅长的,最后《草莽艺人》就有点喧宾夺主了,照片成配图了。

记者:有没有书作为你写作的一个参考?

田川:我觉得写作的时候还真没有一个参考的东西,给我个人影响比较大可能有两类类型的书。我第一本书起名叫《东京记》,是跟中国古籍《东京梦华录》有关,还包括《扬州画舫录》、《海上花列传》、《儒林外史》这类的书。我喜欢古籍中记述社

会生活百态的杂记类著作,好像没有一个完整情节,其实,生活的日常就是这样,没有那么多戏剧性。另外一类就是日本的私小说,很像随笔,有很强烈的个人感在里面,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波澜壮阔的情节,很散漫,但是给你的冲击很大。

另外,我在日本看了大量的片子,当时国内根本看不到五六十年代世界各国的经典电影,日本全有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影视训练,看了这些后,我突然发现,这个时代最好的作家都是电影和纪录片的作者,小说已经成为一个古董了,它能影响的人很少,满足感也很小,反而是那些话很少的东西更有意思。潜移默化,我当时就想怎么拿影像来表达。

记者:触发你去找乡村艺人的原因是什么?

田川:其实最重要的是在日本看过一张照片,摄影师在一个日本的歌舞伎的舞台上,透过木地板的缝,拍下面一个艺人在化妆。那张照片对我的印象特别深。我的父辈来自于农村,血液里有北方曲艺的因素,那张照片可能就把血液里的那种因素激发了。所以我就很痴迷于那舞台后面的东西。回国以后,我自己就想,我们的传统在哪?从事这些行业的人现在在干什么?反正闲着也没事,就去找他们吧!这样就开始了。

接触艺人不容易

记者:网上的简历说,你去日本的三年是学习刷碗、搬报纸和纪录片?

田川:我在日本大学艺术学院学的是纪录片。但只限于理论层面,没有机会摸摄像机的。在日本生活艰辛,我自己赚钱买了个相机,没时间休息,所有照片都是来回打工、上学的路上拍的。那时候日本有很多中文报纸,此前我在国内没发表过作品,我给日本的报纸写过几篇小文章,却发现一篇小文就够我累死累活干一天的工资。那不如多写几篇,后来基本百发百中,就有信心了。如果生活不那么逼,我可能还永远是一个文学爱好者。

2000年回国之后,我不知道要干什么。但是有一种悲愤的情绪。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。在国外很孤独,回国后看到很多现实。就想拍点什么,写点什么发泄

一下。

《草莽艺人》在2002年出版以后,央视一个编导找我,想拍里面的一个素材,我就提供了线索;后来他说你为什么自己不拍一下试试,我就拍了《台口》,还得了奖。就这样,我就进央视拍纪录片了。

第二次去跟拍丝弦,我是以中央电视台编导的身份去的。跟石家庄丝弦剧团跑了半年,到处跑台口,这个感触就更深了。因为第一次我是作为普通人的身份去的,他们会把你当成一个戏曲爱好者;下面的演员们很自然地对待你,领导们也不把你当回事。有人说,摄像机就是权力,等我有了一个央视的身份,扛着摄像机再去时,变化来了。剧团的领导们都出来了。他们不停地开会,希望你去看他们主持会议。他们让我拍什么我就拍什么。我在后来的片子里剪了一段会议:领导在煞有介事地说官话,下面的演员扣指甲的、烦闷抽烟的、挤眉弄眼的、调情的;片子放出来,剧团领导很不满意,因为没有突出他的“业绩”。但我只怕忠于我感受的东西。

记者:书中的草莽艺人十年以后还有联系吗?

田川:很少了,因为有很多艺人可能都不记得我是谁了,匆匆而过。我到一个个地方目的性不是很强,我是先设定一条路线,比如说我沿着黄河,进陕西,目的地也不知道。觉得累了就回北京。我找艺人基本上是见谁问谁,一路打听一路走,找不到也无所谓。

后来某报纸的一位朋友说,你太不了解中国现实了,容易出问题。于是弄了一张介绍信,但是地方文化部门的同志们一眼就看出来,单位跟单位之间不是这么联系的,提前不打招呼是不可能的。我在山西运城的宾馆里苦苦等了三天,他们说文化局局长会回复我,但根本没人理你。当时觉得这个过程特别痛苦,后来才发现这个过程甚至比寻找艺人本身还有意思,因为它反映了你在中国生存的现实。

记者:这也是《草莽艺人》对比《东京记》最大的特点?

田川:对,我写《东京记》比较冷静的,写《草莽艺人》就投入了情感。句子也会长。你写别人的事总是尽量客观,但写自己的国家和社会,我觉得就是家里人,有很多这种嘲讽和幽默。

我的大学老师当时看了《草莽艺人》,不喜欢。觉得里面有歧视农民的倾向,有来自城市人的嘲讽。他理解错了,嘲讽是针对我作为中国人这个存在的,是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嘲讽,也是自嘲。可以看看英国人、日本人写的很多东西,他们对自己的嘲讽比对别国人辛辣多了。这里有一种宽容和自信的态度。



《草莽艺人》,田川著,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版,38.00元。

寻找“文化中国”

记者:在和艺人下乡演出生活在一起,短时间内怎么把陌生感消除掉?

田川:大家可能理解不了,因为我在日本太长时间没说话了,回国后我很想和陌生人说话。与草莽艺人打交道,我突然有了一种归属感,也许这是父辈们来自农村的血缘在起作用。那些艺人们被长期忽视,当看到一个操着北京口音,拿着相机的家伙出现时,就想跟你倾吐。实际上大多的时候,都是他们在说,我在听。我说我想拍你们,他们都很热情,没有拒绝的,一路上都在照顾你。一两天陌生感就消除了,中国乡土社会有很多可贵的东西,让人感动。书中那些二人转演员,演出完了都跟我睡在一张床上,后来我在电视里看到他们大红大紫的时候,老在想那天晚上他们在床上说的话,有种做梦的感觉。

记者:面对书里的人物,给杂剧丝弦艺人拍照,你觉得他们很可怜。但到二人转的时候,你对他们有很崇高的敬意,怎么来理解这种复杂的情绪?

田川:因为太少人关注他们了。比如丝弦,它是河北省非常重视的一个剧种,石家庄市丝弦剧团也是很大的一个剧团,但当演员们看到一个拿着相机的人出现时,会不断请你为他们拍张照片。

他们基本上就已经没有尊严了,为了拍一张照片,那么大岁数的老演员,天天爬起来去晨练,我要不去,他早就不晨练了。你说这有尊严吗?我心里有一种悲伤,你的文化已经衰落到什么程度了?

记者:选择拍哪些艺人,有什么规律?

田川:我当时自费去拍艺人时没什么钱,所以选择比较近的北方。除了经济原因,还有文化因素。后来我也去南方拍过,包括川剧变脸、福建的布袋戏等,但是没有写到书里,因为我没有共鸣。中国文化,每个地区之间的差异非常大,我熟悉北方,只能写最熟悉的,我到陕西就已经有些隔膜了,所以我走到咸阳就不再往西走了。

记者:书中序言说,“为文化中国做一部纪录片”,《草莽艺人》正是这个想法的起点,这个纪录片已经开始实施了吗?

田川:序言中我没有把这事说透。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用一种“文化中国”的史观去看历史。“文化中国”靠什么来支撑呢?一个戏、一件文物、待人接物、举止言谈……是这些具体的细节。只有通过教育,通过滋养灵魂,从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最根本的细节改变,最终才能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。我是做历史纪录片的,你站在一个什么态度上去创作:是去迎合越来越粗鄙的大众趣味?还是建设一点什么,给大家讲故事的同时提供一些文明层面的思考?这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问题。

记者:近期的计划是什么?

田川:我现在在做纪录片《西洋镜——外国摄影师镜头里的中国》。外国摄影师从19世纪中叶开始拍摄中国,一直拍到现在。我们历史书上的很多照片都是人家拍的,但我们都不知道,或者根本不在意。没有人去梳理这些东西。这些外国摄影师有很多传奇故事;他们为什么来拍中国?他们拍到了什么?我希望能做一些细节的工作,让我们的心灵更丰富一些。

赵大伟 南都供稿
图片由受访者提供